



# 寫在哲普退潮前的幾點反思

## —從「世界哲學日」意義談起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常逛書店的人一定會發現，近幾年哲學相關的書籍，不僅數量，能見度也增加了，一進門的展示櫃上常常擺了不少最新的哲學書，特別是翻譯的哲普書籍，不但有譯自英語、法語、德語、西語的歐美著作，來自日本與韓國的作品也不缺席。

此外，「哲學星期五」在過去七年來已經在整個島嶼上遍地開花，其他類似的文化沙龍也如雨後春筍地出現。媒體與臉書更常能見到「哲學哲學雞蛋糕」、「哲學新媒體」、「Phedo（台灣高中哲學推廣教育學會）」等致力於哲學普及工作的組織，舉辦各種講座、讀書會或哲學營的活動消息。由上述Phedo成員所規劃的南港高中人文實驗班，業已堂堂進入第四年，台灣師範大學也即將於下個月開始招收哲學教育學程的學生，替未來的高中哲學師資做準備。打開收音機不小心轉到教育廣播電台，有機會碰巧聽到「哲學Café」，甚至準備看民視新聞的人還可能不小心看到「哲學現場」和「哲學談淺淺地」這種，過去難以想像能存在主流電視台的節目。

此時說哲學普及是一種熱潮，或許不為過。事實上，哲普的推動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近年來力推的計畫，並於2005年巴黎會議正式將每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四訂立為「世界哲學日」（World Philosophy Day）。

### 肩負國際使命的哲學教育

雖然如此，但相信記得「世界哲學日」是幾月幾日的人並不多，正如曾經擠滿整個台大體育館聽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講課的學生，知道他的上課方式與內容，不過是西方大學哲學系新鮮人的日常，或許也不多。

聯合國制定世界哲學日，事實上賦予了這個人類最古老的知識探索活動，一個嶄新且重大的國際使命：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從而學習如何共存。誠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網站，不但指出哲學之重要性在於培養個人、文化乃至人類整體的思想發展，並以該組織前總幹事博科娃（Irina Bokova）底下這一段話揭櫫世界哲學日之意義：



面對錯綜紛雜的當今世界，哲學思考首先需要我們謙卑下來，從自己立場退後一步，參與理性的對話，並針對我們所無法左右的挑戰，共同提出應對的措施。這才是教育開明的公民，使其免受愚昧和偏見困擾的最好方法。我們遇到的困難愈大，愈需要通過哲學來理解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事實上，這一段話出自博科娃在以「未來世代」作為主題的2012年世界哲學日當天所做的演說，在此之前還有一句話：「蘇格拉底曾說，哲學是一種『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的意識狀態。」當然，哲人並非真的一無所知，而是知道自己所知容或有誤，因此，唯有謙遜才能反思自己所知，並探究未知。於是，博科娃之後接著說：

沒有一種哲學傳統可以對上述問題做出權威性回答。哲學的多樣化是我們培養兼具包容與寬容的全球公民意識之最大財富。面對無知以及不寬容的泛濫，哲學有助於相互理解。

值此世界哲學日之際，教科文組織願意再次強調哲學改變世界之力量，因為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改變自己——讓我們更加嫉惡如仇，有更清晰的思緒問對問題，且能更堅定地捍衛人性尊嚴。總而言之，哲學是打開新人文主義大門的鑰匙。

是故，哲學不但必須肩負啟發促進全球公民意識的使命，哲學教育也被賦予了一個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責大任。

其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2年已確立了世界哲學日的日期，並在全球各地舉辦了各種慶祝活動，推動哲學教育的發展，加強哲學探索在其他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重要性，並促成國際性的跨學科合作與對話，所以，2005年巴黎會議的召開旨在檢討過去三年來的接受度與成效，並進一步擬定未來的工作事項。

根據該會議的報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必須首先建立起一個正式的平台，結合全球的高等教育機構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讓大眾更能接觸到哲學，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一個定期舉行的全球性哲學論壇，邀請世界各地的哲學教育推動者召開大會，促進哲學教育在中學階段的進行。換言之，聯合國自始認定，哲學的推動如果要達到培養全球的公民意識以及國際觀的養成，必須從中學開始做起，且推廣至一般社會大眾，甚至，也注意到了兒童哲學教育的普及可能。據此，教科文組織確立了底下五個工作要點：

- (一) 促成聯合國的成員國同時在國內、區域性與全球層次，致力於哲學教育。
- (二) 促進當前全球重大議題上的哲學分析與研究，作為更有效回應人類此時所面對的挑戰的方式。
- (三) 提升一般大眾的意識，認知到哲學與批判思考，對於許多社會在因應全球化以及進入現代性之後所必須做的各種選擇之重要性。

(四) 評估當前世界各地哲學教學的情況，尤其在能否平等接受哲學教育方面。

(五) 強調哲學教育普及化對於未來世代的重要性。

藉由上述五項要點工作的擬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重新定位了自己，從呼籲者走向了積極推動者的角色，主動提出各種具體方案，來促成各國政府在中學教育中增加哲學思辨的養成，「將哲學的嚴謹態度以及思考樂趣傳承給年輕世代，幫助他們通過學習不同觀點與經驗，來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並通過理性思維建立未來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人類社會。」如此一來，世界各地的哲學教育推動者與相關組織，從此也有了共同的發展目標和合作對象。

### 從尋求宗教共識到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

制定「世界哲學日」的背後，其實也有一套政治哲學。欲理解其內涵，首先，我們或許可退一步，從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巴黎舉辦的「世界宗教與人權」研討會開始談起。會議當中，瑞士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提出〈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就沒有世界的和平〉（No Peace without），受到與會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儒家等六大宗教代表學者熱烈地回應。以此為基礎，孔漢思於1993年起草了一份《走向全球倫理宣言》（Towards a Global Ethic: An Initial Declaration），並於同年在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上獲得通過。

前年過世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劉述先教授，本人參與過1989年的世界宗教與人權會議，並以儒家焦度回應孔漢思。據其解釋，全球倫理運動是為了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種新人類處境：科技進步帶來的各種機遇與威脅，包括全球暖化問題；全球資本經濟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與貧富差距，不僅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存在於國與國之間——這些問題無法從傳統思想直接提出解決方案，而是必須由身處不同文化的人共同參與，一方面尋求不同文化之間的倫理共識，一方面藉此建立一套新的全球性價值體系，方能因應全球性問題。

事實上，孔漢思亦曾於1997年聯合其他學者起草了一份《人類責任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for Human Responsibilities），其共同簽署人包括了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英國前首相卡拉漢（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內的二十四位前國家元首。該宣言不僅重申了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為人類共識，且「全面承認人的尊嚴及其不可剝奪的自由、平等與團結互助」，也強調「對這些責任的覺悟與領受，應在全世界得到教育和推動」。

孔漢思的構想最後在1997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採納，進一步推出了「普世倫理計畫」（Universal Ethics Project）。不過，該計畫在主持人金麗壽（Yersu Kim）博士發

表了《二十一世紀倫理共同架構》(A Common Framework for the Ethics of the 21st Century) 之後，不再有後續活動。目前正在進行的最相關項目，似乎是致力於醫療倫理與環境倫理的「全球倫理觀察站」(Global Ethics Observatory)。另一方面，原本的「跨宗教對話」(Inter-religious Dialogue) 計畫，似乎也由「跨文化對話」(Intercultural Dialogue) 計畫所取代。「世界哲學日」目前就是和該計畫同列為教科文組織正在進行的「學習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主題計畫底下的子計畫。

姑且不深究原本的「跨宗教對話」以及「全球倫理計畫」何以終止，我們必須承認，孔漢思主導的世界宗教與人權會議，自始並非毫無阻力。首先，即使在尋求跨宗教共識的階段，便有來自印度與中國的學者直言，孔漢思對於非西方文明與宗教的理解與描述，存在疏漏。這也是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辦「中國傳統倫理與世界倫理」研討會的理由。一個可以真正因應當前人類處境的世界倫理，似乎難以藉由跨宗教共識來建立。無論如何，孔漢思共同起草的《人類責任宣言》已大幅降低了原本在《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當中濃厚的宗教性，而他所呼籲的宗教對話，最終取得的重疊共識是「對話」本身，以及進一步理解不同文化之內涵的必要性。

置於此一脈絡之下，我們得以理解為何哲學教育被賦予了上述的重責大任。首先，正如前文提及的博科娃所說，哲思活動是一種讓自己進入「一無所知」的蘇格拉底式謙遜，也就是對自己所知存疑，願意退一步來思考自己是「如何」得知現有的理念與信仰，以及這些已知究竟能否禁得起嚴格的邏輯檢驗，甚至，在與其他不同或相對立的價值體系相較之下，是否真的值得我們所擁有或追求。再者，雖然退一步的意願，是哲學的第一步，自我反思的起手式，但，對於向來（被教育成）只相信傳統權威或自己文化具有獨特優越性的人，卻相當不易，因此必須自幼開始培養。最後，也唯有當這樣的反思意願成為一種日常，才可能以謙卑、同情理解乃至學習的心態，來對待異己，當他與自己平等，進而願意對話。

## 哲學教育在國際社會上的實踐與反思

世界哲學日正式進入聯合國體制至今，愈來愈多的國家在中小學引入了哲學課程，各種提供哲普課程、座談與演講的營利與非營利相關組織，也不斷出現。原本就有十八個國家（曾）提供高中哲學課程的拉丁美洲，表現卓越，巴西更於2008年正式將哲學列為必修。當然，歐盟原本就有許多會員國提供高中哲學課程，依舊亮眼，萬眾矚目的法國高中哲學會考制度，歷史更可回溯至十九世紀拿破崙第一帝國時期。歐盟會員國當中，如今有二十四個國家高中階段設有哲學課程，一半採必修制，一半則是選修制。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英國是歐盟會員國當中相對較晚引入高中哲學的國家，但其深厚的公共知識份子傳統，從休姆(David Hume)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發動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到維多利亞時期由邊沁(Jeremy Bentham)所領軍，包括約漢·彌爾

(John Stuart Mill) 在內的「哲學激進份子」(Philosophical Radicals)，不乏介入公共爭辯的哲學家。而BBC(英國國家廣播電台)著名的「里斯講座」(Reith Lectures)，從羅素(Bertrand Russell)率先於1948年進行演講，節目至今依舊深受歡迎，哲普傳統亦可謂淵源流長。甚至，BBC在1990年播出的「六歲孩童也能認識的蘇格拉底」(Socrates for 6 year olds)節目，更是開啟了大眾傳媒的兒童哲學之濫觴。不過，正式將哲學引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畢竟是在世界哲學日的制定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至少是推波助瀾。此外，哲學正式引入高中之後也掀起了另一波哲普熱。知名作家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2008年創立於倫敦的「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算是趕上了潮流，其分校在過去十年來已拓展至十二個不同國家的城市，包括台北，提供各種哲普課程與講座。

另一方面，世界哲學日正式進入聯合國體制之後，教科文組織的腳步也不停歇，推動的同時不忘一邊反思與檢討，並於2007年出版了一份長達三百頁，題為《哲學：自由的學校》(Philosophy: A School of Freedom)的研究報告。它首先介紹了該組織的哲學教育理念，實踐，以及反省與未來想像，同時也提出了相當詳盡的哲學教育的方法論。接著，該報告則依序非常嚴謹地討論了全球各地推動學齡前兒童、中小學、高等教育以及體制外的哲學教育實踐狀況以及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且根據前文提及的理念與目標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事實上，該報告甚至引發了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的區域合作。多明尼加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隨即在2009年共同舉辦了大型哲學教育會議，仿照上述報告的結構詳細檢討了哲學教育的區域性共同未來，與會代表來中南美八個國家。

筆者在此當然不能細說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內容(有興趣的讀者當可自行閱讀，若有出版社願意翻譯則更能裨益大眾)，僅能綜上所述從三個大方向提出些許觀察與反思。

首先，相較於眾多聯合國成員國政府競相引入高中哲學，甚至兒童哲學教育(據悉，澳洲是當前的典範)，我國政府似乎尚未有意願與國際接軌，而哲學教育與哲普的推廣工作，目前主要由民間團體所承擔。這一點與美國相同。該國乃當今西方先進國家之中，哲學尚未納入高中課程的國家。當然，美國也有零星幾所大學——例如杜克(Duke)——以夏令營方式提供高中生體驗哲學課程，不過，那是相當高度篩選的菁英課程。這倒是與科技部人文司舉辦的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營或教育部協辦的各種人文社會資優班類似。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推動的，是普及性質的哲學教育，並非意在服務菁英。

姑且不論這是否與凡事以美國馬首是瞻有關，再者，台灣政界與政治學界的確奉行美國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理論，亦即相信「國際場域是一個沒有道德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國家對外行動必以攫取經濟利益或政治權力為唯一目的」，不僅基本上視歐洲主流政治學界倡議的「國際社會」與「國際正義」理論為無物，甚至貶抑政治領域談論倫理道德或政治哲學。然而，孔漢思力推全球倫理是為了對抗美國學界一面倒的現

實主義信仰，至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繼續推動文明對話則是為了不讓影響國內政治學界甚巨的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提的那種「文明衝突論」，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同樣姑且不論是跟隨美國，亦或尚未走出發展中國家心態，台灣的教育向來著重實用，崇尚科技，且致力於經濟成長，然而，猶記前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年推動全球倫理，意在呼籲所有國家共同攜手合作，共同解決科技、現代性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一起面對人類共同的處境，貶低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幾乎等同站在製造問題的那一邊，而非試圖參與國際社會來共同解決問題。

無論如何，當人們相信權力就是正當性，財力與武力才是真正實力，且不在意科技與經濟發展所衍生的倫理議題，甚至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時候，關於價值衝突與選擇的分析，道德兩難的公共思辨，或許顯得無力，哲學根本無用武之地了。同理，當人們深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乃唯一真理，與異己對話也不過是多餘。然而，哲思就是去思考那些尚未被思考的一面，揣想另一種人生與世界的可能；實際遭遇的異己，則可謂這種「另一個可能」的具體存在。是故，哲學教育也將讓人們理解到，企圖實踐自己理想或意念的時候，必須止於相對的正當性——相對，指的是不能當自己的想法為絕對，也就是顧及尚有持著不同看法的他人也同樣存在，因此必須透過對話來折衷與妥協。

最後，此時方興未艾的國內哲普運動，或許也可以從致力於個人邏輯思辨與批判能力的訓練，開始接軌國際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哲學教育之方向，亦即促成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精神，以及未來世代的世界公民意識之養成，從而不再視國與國之間為你爭我奪的競技場，亦或利益的交換市場。畢竟，這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世界哲學日的真正意圖。當然，這裡所說的「世界公民意識」包括了跨文化對話的意願，以及與國際攜手共同面對全新的人類處境與挑戰的準備。

換言之，如果此時的哲普熱潮不是一種勢必不久將會過去的流行，而是反映了國際上逐日高漲的哲學教育意識，或至少是回應，那麼，我們或許可進一步將哲學與人類共同命運作出更緊密的連結，並為未來與其他國家公民進行跨文化對話做適當的準備——對話，是因為我們也有話可講，亦即有我們自己的文化內涵來向國際社會訴說，因此，在致力於學習各種西方概念與理論的同時，尤須更加深社會的自我理解，讓我們社會的共同經驗、歷史記憶以及來自不同族群和移民世代的多元文化，一方面得已成為其他國家的思想資產，另一方面為人類處境的共同出路，也做出貢獻。這其實也是一百年前居住在這一塊土地上的哲學家所曾經認真思考過的可能，但我們忘了！◆